

滿天星斗

苏秉琦论远古中国

苏秉琦 著

赵汀阳 王星 选编



滿天星斗

苏秉琦论远古中国

苏秉琦 著

赵汀阳 王星 选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 / 苏秉琦著；赵汀阳，王星编.--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11
ISBN 978-7-5086-5991-6

I. ①满… II. ①苏… ②赵… ③王… III. ①考古工作—研究—中国 IV. ①K87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61017号

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

著者：苏秉琦

策划编辑：王文婷

责任编辑：王文婷 赵世明

营销编辑：陆 丝

责任印制：刘新香

装帧设计：周伟伟

书名题签：张忠培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承印者：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12 字数：220千字

版次：2016年11月第1版 印次：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5991-6

定价：46.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400-600-8099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书名题签 张忠培

写在《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前面的话

张忠培

秉琦师离开我们已经近二十年了，现中信出版社意欲出版这本《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向秉琦师致敬，并邀我为书作序。而我身为秉琦师的学生，不能逾矩为师长的著作作序，只能作跋。

苏秉琦先生为中国考古学做出的贡献及所取得的成就铸成了一座巨大的丰碑。这座丰碑是中国考古学跨入成熟期、进入新时代的标志，其内涵是治中国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的理论与方法，他从这一理论与文化得出了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多中心或多元说和政权统一、文化多元说（即“满天星斗”）；以及文明形成的“原生型”“次生型”和“续生型”的三种类型说，“古国一方国一帝国”的国家发展的三阶段说。这就是他的一个中国史观基本理论和两个学说。

无论是秉琦师的治中国考古学文化的这一基本理论，还是他释读中国文化和历史进程的这两个学说，都植根于中国大地，是从中国考古学文化遗存与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得出的认识。对考古工作者来说，不对具体的遗迹、遗物做全面深入细致的考察、分析，就不可能发现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也不可能发现生产技

能的提高、社会关系的变动、生活习俗和艺术创作等上层建筑领域的变化；不对各文化的总貌、历史地位和相互关系有所研究，对具体遗迹、遗物的研究势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揭示历史的本来面貌也只能是一句空话。苏秉琦先生把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很好地结合了起来，正是在做了大量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概括各考古学文化共性与差异性的宏观研究。这本文集既收录了《百万年连绵不断的中华文化》《文化与文明》这样形而上的研究著作，也收入了《关于“几何形印纹陶”》《瓦鬲的研究》这样形而下的文章，使读者更易于理解，由苏秉琦先生创立的治中国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及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研究说和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多中心或多元说和政权统一、文化多元说（即“满天星斗”）是在什么样的方法论基础上，在积累了多少实际材料的条件下和经过了多么长期的分析探索后才出现的。

苏秉琦先生在1981年正式提出了考古学研究中的“中国学派”已经出现这一认识。他说：“在国际范围的考古学研究中，一个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国学派开始出现了。”这个“中国学派”，按照我的理解，即是在科学发掘的基础上，运用由中国学者所发展的考古类型学方法，分区、分系、分类型地研究各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过程，通过考察中国考古学文化的谱系来研究中国这一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并研究这一总过程中各考古学文化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的不平衡性。苏秉琦先生的理论已经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主流，引导着中国考古学的正确方向，是今天的中国考古学走向前方的一面旗帜。是以为跋。

2016年7月21日

《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选编代序

赵汀阳

王星邀请我一起合作选编这本《满天星斗》，我深感荣幸。我一直从事哲学研究，既非考古学家，亦非历史学家，如果说与苏秉琦先生有一些缘分的话，那就是我从苏秉琦先生的思想中获得过许多启示和教益，而此思想缘分与李泽厚先生的指路直接相关。

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开始以哲学方法去反思“天下”概念，进而又分析“中国”概念，试图解释在“天下”和“中国”的历史性之中所蕴含的哲学意义，此项研究需要参照实证知识，不能仅仅依靠古典文本去理解中国的历史路径和格局。李泽厚先生身兼哲学家与历史学家，实为求学问道之近水楼台。讨论中，李泽厚先生屡屡提及王国维、陈梦家、苏秉琦、张光直、裘锡圭、徐萍芳、李伯谦等考古学家的成就。虽然时隔已久，我仍然记得李泽厚先生给我的三个态度鲜明的建议：（1）“物之所言比言之所言更有力，所以一定要重视考古学的证据”；（2）“中国文明的初始秘密就藏在新石器时代的物证里”；（3）“要特别注意苏秉琦的思想”。应该说，前两点基本上是显而易见的共识，而第三点却是

一个具有特别意味的方向指示。李泽厚先生对苏秉琦先生思想的“特别注意”很可能与他的哲学思维有关——他终究同时是或根本上是个哲学家，因此更关注物证所能够开发的思想，而这也是苏秉琦先生的学术风格：在实证知识的基础上，展开几近哲学的分析和推想。

苏秉琦先生的“满天星斗”论点就是一个具有思想性的历史解释模型。按照传统的历史叙事，中国的政治权力核心或者说政治中心的形成甚至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距今约 5000 年前或更早；但根据现代考古学和史学研究表明，那种传统叙事其实是将后世中央王朝政治制度倒映为远古格局的想象，是一种基于认祖归宗的历史叙事与政治合法性追认。尽管这种现实倒映为历史的政治追认早已被证明为一个神话，但许多人却又接受了另一种替代性的文明起源中心的想象，即相信中原自古就是中国文明的核心，黄河中游地区是中国文明的“摇篮”，中原文明代表了自古一直领先发展的中国文明。这种广为接受的历史想象并不完全是错误，但其中却包含某种一厢情愿。苏秉琦先生提出的“满天星斗”的解释模型纠正了这种理解偏差，简单地说，新石器时代的中国，甚至到夏商时期，其实同时存在着发展水平相近的众多文明，散布在中国的四面八方，犹如天上群星之星罗棋布，而中原文明只是众星之一，而且并非众星之核心。满天星斗时期大约持续了 2500—3000 年或更长，占去中国文明发展史的一半或一半有余的时间，应该是中国文明的奠基阶段。在今天，满天星斗模型已经广为人知，应该说是关于中国新石器时期的最优解释模型，尽管并非没有异议，但其基本解释力却难以撼动。

苏秉琦模型中比较容易引起异议的是他关于中原文明是“次

生型文明”这个不符合传统情感的论断。其实苏秉琦先生的论点在实质上并没有“次生型文明”这个说法显得那么激进，他并没有否定中原文明有其本地根源，而只是指出，中原文明的形成具有明显的合成性质，有着来自东西南北各个方向的文化因素，尤其是来自北方“原生型文明”的影响，其中，北方文明的南下影响形成一个Y型通道，即辽西文明和内蒙古高原河套文明通过山西晋地到达晋南的通道，这个Y型路径被认为是中华文明多根系中的关键性“直根”。苏秉琦先生的论点自有其说服力，我是这样理解的：把远古中原文明看作是农耕文明，其实也是一种把后世情形倒映为远古情形的想象。尽管商周以后的中原文明越来越具有农耕文明的风格，但在此前的数千年间，牛耕和铁犁尚未出现或尚未广泛使用，农耕的生产力有限，不足以形成农业为本的经济生活，中国各地的生活都是渔猎、游牧和农耕三合一的混合经济生活，尚未分化为后来所谓的农耕部族和游牧部族，就是说，后来所谓的胡汉之分，在分化之前原本是同类人。在早期中国，从内蒙古、辽西到中原，人们的生活技艺大体相似而各有所长，在实用知识和技术上互相学习也是自然而然的。古代传说中的黄帝对中原核心地位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而黄帝部族就是渔猎、游牧和农耕三合一的典型，历史记载，黄帝部族流动地移营而居，看起来更接近蒙古高原南部地区的生活方式。假如把黄帝理解为一个象征性符号，那么，以黄帝为代表的早期中国人很可能就是后世的北方游牧族群和中原族群的共祖，或者说，是Y型通道所形成的中国核心文明的共祖。

满天星斗模型可以引出许多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尽管每个文明世界无一例外地都存在着冲突和战争，而且不可能完全解

决这种矛盾，而中国文明却有着更明显的和平倾向以及以和平观念为基础的思想体系，或是一种能够尽量减少冲突的文明。不过，和平思想是形成中国文明格局的“第二步”，而并非最初之“第一步”。中国何以能够形成以和平原则为基础的文明？这是一个尚未得到充分解释的问题，而这应该是发生于满天星斗时期的事情（西周时期的和平观念已经非常成熟）。我们也许可以推想，在众多文明之间存在着“恰当”距离的满天星斗时期，人们在理性选择上更容易倾向于和平交往而非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恰当距离”的形成基于若干自然和历史条件：地理的广阔，各处皆有足够大的安家立业空间，不至于造成生存空间竞争；各地资源都足够支持一个群体的生存所需，而不至于形成经济学所谓的资源稀缺所导致的零和博弈；各地的文明发展程度相近而在技术上各有所长，不至于因财富的巨大差距而导致难以抑制的嫉妒；尤其重要的是，各个文明之间的距离不远也不近，这使得技术传播与交往成为可能，同时使发动战争的成本高于受益，因此，除非出现怒不可遏的偶然仇怨，战争的积极性通常低于和平交往和互相学习的吸引力。

基于满天星斗格局，假如确实存在着各个文明地点之间的“恰当距离”，那么，商周之前早期中国的各地文明之间对技术学习的兴趣大于战争就应该是合情合理的。古人相信远古是个“竞于道德”的时代，看来也并非无稽之谈。当然，即使在“竞于道德”的时代，战争也时有发生，比如炎帝、黄帝与蚩尤之战，我只想说，在众多文明之间有着恰当距离的满天星斗时期，战争并非谋生的最优策略。在远古时期，发动远距离战争或大规模战争恐怕非常困难，在拥有车马之前，以步行去发动远距离或大规模作战，后勤补给、通讯和组织都是不堪重负之事。因此，在很长

时期里，远距离的大规模征服是无比艰难的事情，而与之相较，远距离的文明交往却能够通过无数聚落之间跳板式的逐步传递而得以实现。可以想象，文明交往优于战争的和平模式维持的时间如此之长，或许有助于形成和平主义的思维定式。许宏先生的《大都无城》一书说明了早期中国众多方国的都城尚未发展出作为战争防御功能的城墙，这似乎意味着那时各地部族有着基本的安全感，并非处于时刻备战的紧张状态，因此也暗示着当时并不经常发生致命的部族决战或大规模战争。总之，各地文明之间存在着恰当距离的满天星斗格局使得知识和文化学习交流的诱惑大于战争的冲动，这有可能是中国文明得以形成和平主义基因的一个客观条件。当然，另一个决定性因素是中国文明没有发展出一神教，因此没有理由去制造不共戴天的文化敌人，也难以形成文明的冲突，因而倾向于多元合作；于是，古代中国的权力追求是世俗权力，而不是有我无他的精神独裁。这一点不知与满天星斗格局是否有某种关系，但满天星斗格局持续了数千年，这个长时段很可能是中国文明形成其多元性质的有利条件，至少肯定不是发展一神教的有利条件。

这里只是些许续貂猜想，是否合理，还有待专家明鉴。是为代序。

2016年7月2日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写在《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前面的话 / V

《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选编代序 / VII

第一章 问题与综述：中国文明的初始秘密

百万年连绵不断的中华文化 / 002

- 一、绕出两个怪圈 / 006
- 二、区系类型说的主要论点 / 009
- 三、中原文化不是中国文化唯一来源 / 010
- 四、中华文明发展有自己的道路 / 012
- 五、中原文明是次生型文明 / 016
- 六、文明要素与文明因素之辨 / 018
- 七、“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的说法不确切 / 019
- 八、长城是各民族文化的熔炉 / 021
- 九、多源一统、历久不衰的原因 / 022
- 十、中华文明的精华 / 023
- 十一、世界必将走向“大同” / 026

重建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 / 029

- 一、旧石器时代 / 029
- 二、新石器时代 / 032
- 三、史前时代社会的分工和分化 / 038
- 四、文化的分区与重组 / 042
- 五、古史传说 / 044

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 / 048

- 一、中国史前史的性质与任务 / 048
- 二、中国史前史的内容和时、空框架 / 051

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 / 065

- 一、关于“重建”的回顾 / 065
- 二、区系类型考古的实践与理论 / 071
- 三、从区系的中国到区系的世界与世界中的中国 / 082

文化与文明 / 096

- 一、背景——历史的反思 / 096
- 二、中国考古学新时期的两个标志 / 098
- 三、中华文明起源的几种形式 / 102
- 四、我们学科的目标 / 105

第二章 满天星斗格局

象征中华的辽宁重大文化史迹 / 108

- 一、中华文明曙光的象征——红山文化坛、庙、冢 / 108
- 二、中华民族的象征——辽西古长城 / 109
- 三、中华统一国家的象征——秦汉“碣石宫” / 111

中华文明的新曙光 / 114

关于辽河文明 / 127

关于环渤海—环日本海的考古学 / 135

仰韶文化研究与中国文化起源问题 / 144

- 代序言 / 144
- 两种“小口尖底瓶” / 148
- 两种花卉图案彩陶盆 / 148
- 两种动物图案彩陶盆（鱼、鸟） / 149

目 录

- 仰韶文化的去向 / 152
仰韶文化的源流问题探索的启示 / 155

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 / 158

- 一、引言 / 158
- 二、什么是半坡类型和什么是庙底沟类型 / 159
- 三、庙底沟类型主要文化特征的分析 / 167
- 四、半坡类型主要文化特征的分析 / 172
- 五、庙底沟类型和半坡类型的关系 / 175
- 六、年代和分期 / 181
- 七、社会发展阶段 / 186
- 八、分布和分区 / 192
- 九、同其他原始文化的关系 / 196
- 一〇、结语 / 204

仰韶文化同历史传说的关系 / 208

- 神农氏时代 / 208
黄帝尧舜氏时代 / 209
夏代 / 210

谈“晋文化”考古 / 215

- 一、作为中原古文化一个组成部分的晋文化 / 217
- 二、作为北方古文化一个组成部分的晋文化 / 219
- 三、中原和北方两大古文化区系间的重要纽带 / 228

关于陶寺发掘报告编写及有关问题 / 236

- 一、关于陶寺遗址的文化特点 / 236
- 二、关于发掘资料的整理和报告编写 / 241
- 三、关于晋南的考古学课题 / 253

楚文化探索中提出的问题 / 256

- 一、楚文化探索的对象和目的 / 256
- 二、探索楚文化的特征和渊源问题 / 258
- 三、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文化面貌的阶段性变化和诸地区间文化关系的变化 / 264

关于“几何形印纹陶” / 268

- 一、写作背景 / 268
- 二、关于起名 / 269
- 三、图形分类 / 270
- 四、区系分片 / 270
- 五、江西北部地区的几何形印纹陶 / 271
- 六、江西北部几何形印纹陶的发展阶段 / 281
- 七、与邻近地区的关系问题 / 286
- 八、结论 / 289

第三章 方法与器物

试论传说材料的整理与传说时代的研究 / 292

- 一、引言 / 296
- 二、传说材料的整理 / 301
- 三、传说时代的研究 / 307
- 四、结论 / 319

地层学与器物形态学 / 322

- 一、地层学 / 323
- 二、器物形态学 / 330

瓦鬲的研究 / 337

- 一、斗鸡台出土瓦鬲的形制与年代 / 337
- 二、瓦鬲的分布与演变 / 341
- 三、瓦鬲的发生 / 353
- 四、瓦鬲的消灭 / 357
- 五、结论 / 360

第一章

问题与综述：中国文明的初始秘密

百万年连绵不断的中华文化^①

——苏秉琦谈考古学的中国梦

苏秉琦自述，他至今六十年的研究过程可分为两段，前三十年主要精力花在两个方面：一是绕出两个怪圈，即根深蒂固的大一统观念和把社会发展史当作全部历史；二是找到新的起点。其中第二阶段可以1975年开始提出区、系、类型学说为起点。苏秉琦认为，自己在这二十多年中又走出了两步：一是从宏观角度，围绕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用区系观点选择田野工作重点并做理论探索，最终是为阐明把亿万中国人凝聚到一起的基础结构；二是从微观角度，应用分子分析方法，围绕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对中国文化传统中长期起积极作用的因素，找到它们从星星之火变成燎原烈火、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江河的“破密”的钥匙。

问：香港《明报月刊》总编辑古兆申先生曾拜访您，就《明报月刊》读者关心的一些问题向您请教。但他公务缠身，匆匆回港，委托我继续做这件事，我代表《明报月刊》编辑部向您致谢。

苏秉琦（以下简称苏）：我正式从事考古发掘、研究已六十三

^① 原载香港《明报月刊》1997年7期，此篇文章中节标题为编者所加。——编者注